

论涂尔干机械团结的伦理内涵及道德困境

何 瑶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 涂尔干用社会团结形式的转变为现代性的合理性寻求注释,并在这一社会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出强烈的伦理冲动。以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概念为例,它在团结理论的伦理内涵中孕育而生,却又无法避免对个体自由形成威胁。尽管蕴含在涂尔干团结理论中一种看似合理的社会伦理筹划方案——“有机的机械团结”为社会整合带来了希望,但其终究也将陷入与“机械团结”相似的道德困境。

关键词: 涂尔干; 机械团结; 伦理内涵; 道德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涂尔干的基本问题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个人与社会群体的一般关系问题。”^{[1](p341)}在涂尔干代表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他详细查检了社会分工对“个人与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影响,进而提出意义深远的“团结理论”。涂尔干指出,前现代未分化的社会大体上是一种“机械团结”式的联结,而现代社会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团结”。社会分工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分化,反而产生了一种有机团结的力量,正是这种“有机团结”使得个人越来越依赖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一、社会团结理论的伦理内涵

“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2](p24)},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在个人意识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现代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有机团结架起了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正因为人生活社会里,他便成为一种道德存在,而道德是由群体团结构成的,也伴随着群体团结的变化而变化。假如所有社会生活都荡然无存了,那么道德生活也会跟着一同消失,因为它再也没有依托的对象了”^{[2](p357)}。现代劳动分工不仅产生了有机团结,还产生了一种道德价值,恰如涂尔干所说“分工不仅变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础”^{[2](p359)}。

涂尔干一边对社会分工的伦理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一边又清楚阐释了机械团结本身具有的伦理合理性。涂尔干强调这种团结形式是由于人们彼此相似而形成的,他们就像无机物的类聚一样——相似的个体以机械的方

式联结在一起,“在劳动分工尚不发达的地方,个人是社会化的,因而他不具备自身固有的特性,与其同类共同混杂在集体类型里。”^{[2](p183)}涂尔干既看到了“机械团结”作为一种内在伦理力量维持着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又看到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现代转向是一项不可逆的现代性嬗变。然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力量之所以几乎完全压倒前现代社会的集体力量,一跃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除了种种社会发展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之外,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内在因素——即机械团结社会内部无法规避的令个体陷入自我瓦解的道德困境。

二、机械团结面临的道德困境

涂尔干指出,在机械团结主导的社会中,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是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情感,个体依靠这种共性和相似性对群体产生依赖。另一方面,机械团结社会中的个体均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相联结,意味着个体要将自己的个性与自由淹没于群体的意志之中,换言之,社会对于个人而言总是高高在上的。

具体地看,在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个人始终受到群体的控制而无法享有自由的权利。涂尔干用“集体意识”具体阐释了机械团结社会的一般运行机制,他指出,集体意识是所有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这一总和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生命的特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行动必然来源于集体的命令,这些行动可能违背个体本身的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例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利他型自杀,正是由于前现代机械团结社会中个性的极端退化^{[3](p174)}。可以看出,在机械团结社会中失去个性的人们根本无法享有道德上自由的权利,他们所做出的每一次行

动都是集体意识的产物，换言之，由于个体的自由权利无法真正实现，道德无处扎根，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不得不陷入一种无尽的道德困境。

尽管涂尔干乐观地看到社会分工的发展将“有机团结”推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有机团结的力量赋予个体更多自由，并帮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集体意识的压迫，然而有机团结社会中的失范现象依然层出不穷。涂尔干看到，既然以团结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伦理筹划岌岌可危，创建一种更加完善的“新团结理论”成为紧要任务——这种理论既可以继续保留有机团结社会中个体自由的有效性，避免机械团结社会中的道德困境重演；又能够充分发挥机械团结社会中集体意识的力量，恢复社会组织的整体统一性，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笔者认为，涂尔干并非像一些学者（如帕森斯）提出的那样，只是单纯地希望回归到机械团结社会，涂尔干的理想应当是在现代社会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结形式——有机的机械团结。

三、“有机的机械团结”——社会整合的希望

涂尔干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有机的机械团结”这一概念，但是他在理论成熟期所提出的“重建职业群体”的主张正是将“有机的机械团结”这一理论构想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同时又给予社会整合目标重新实现的希望。

在《宗教社会的基本仪式》一书中，涂尔干通过探究古代氏族社会的图腾制度发现了宗教的起源，并明确了宗教与道德的紧密关联。他认为，道德以宗教符号为载体，因为“符号简单、比较确定而且易于表现，每当此时，这种情绪的感染就会变得更全面、更显著”^{[4] (p210)}；在涂尔干看来，由于道德事实是由具有制裁作用的行为规范构成的，只有道德才能对自由的个体加以限制并禁止他们超出界限之外，而惟一的一种能够凌驾于个体之上、通过合法的方式为个体设定法律的道德权力就是集体权力^{[5] (p7)}。为了重新实现社会整合，涂尔干提出一种将现代社会的“有机”形式与传统社会的“机械”特征相结合的方案——为经济秩序中的职业群体赋予一种它们从未得到过的稳定性。涂尔干提出的职业群体既是治疗现代社会失范现状的良药，也是涂尔干理论构想中“有机的机械团结”的基础。因为只有当群体规模较小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才不至于太大，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所以每一个体首先都要充分考虑群体的利益，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机械关联，

与此同时，个体还必须在维护群体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个体的自由，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有机关联。正如涂尔干认为：“避免这种集体特殊主义和完全投入个人的惟一手段，就是建立一种有义务代表整个集体的专门中介机构，它的权利和利益与这些个别集体是相对的。”^{[5] (p10)}

四、希望的湮灭

作为涂尔干为现代社会提出的一种社会整合方案，“有机的机械团结”要想实现“有机的联结”与“机械的联结”之间的平衡，即实现个体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平衡，不得不面临双重矛盾。因为一旦自由的个体滥用自由，便会对群体的团结构成威胁；而整个社会一旦过分强调群体的优先地位，又无法给予个体充分享有自由的权利，同样能够威胁群体的稳定。涂尔干试图通过建立一种中间机构——“职业群体”来解决这一矛盾，但是这种方案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难以付诸实践。

除此以外，涂尔干的社会本质主义倾向也使得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梦想难以实现。正如渠敬东先生指出，涂尔干的研究建立在将社会作为一种绝对精神的信条，涂尔干所指称的社会既是整体，也是结构；既是根源，又是目的本身^{[6] (p31)}。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或是国家是高于个体的存在，个人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获得一种道德存在；个体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自由，个体发展离不开国家或是社会这样的群体”^{[5] (p53)}。尽管职业群体在调和个体与群体对立，实现个体与群体同步发展方面已达到最优，但是职业群体的群体性特征使其极易滑入“机械团结”的阵营，他们认为群体的利益要高于个体的利益，并且为了实现群体团结在一定范围内牺牲个体自由是不可置否的。不难看出，以“社会整合”为目标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将群体的整合利益视作高于一切，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给予个体更多自由权利，因此涂尔干根据“有机的机械团结”为基础筹划的社会整合理论也不得不面临一种类似于机械团结所遭遇的道德困境。

总之，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是在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和机械团结的运行机制不谋而合，即使拥有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力量作为掩护，涂尔干以“有机的机械团结”为蓝图的社会伦理筹划也改变不了其“机械为主，有机为辅”的内在逻辑，这令涂尔干依靠职业群体重建一个秩序社会的希望也几近破灭。

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重思团结理论

在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涂尔干的社会团结

理论也面临着被责难被解构的威胁。具体而言, 仅仅凭借涂尔干整合理论中的“职业群体”力量, 既无法消除追求自由的个体与强调团结的群体之间的矛盾, 更无法填补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鸿沟——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不断涌现, 地区性的冲突与战争仍然不可遏制, 人与智能技术关系的异化日趋严峻。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伦理或人类伦理。

基于人类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既不是美德伦理学家所倡导的回到乌托邦式的共同体, 也并非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滕尼斯所提出的那种建立于自然意志基础上的、前现代语境下的“共同体”理论, 而是首先强调立足于当代社会, 并对人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思熟虑之后, 所产生的人类在宇宙中的有限性的觉悟。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人类伦理建设的智慧主张——不同于其它抽象的、虚构的主义论证, 它既是一种抽象理论系统, 同样是一份具有实践性的现实指南, 它所维护的是人类文明的和平延续和可持续发展^[7]^(p106)。涂尔干社会伦理筹划的失败启发我们, 面对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文化转型的混乱或失序甚至是价值观的断裂, 首要任务是明确“伦理连接”的重要性——“我们越是自主就越是要担当不确定性和不安宁,

也就越需要连结。我们越是意识到在宇宙中的自我迷失和被置于一次未知的探险, 我们就越需要与我们的人类兄弟姐妹相连结”^[7]^(p102), 也只有依赖于这种超越文化与种族的人类伦理视野, 才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暗示着“类时代”的到来。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竞争,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秉承的价值追求——建立人类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世界, 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p56), 不仅是涂尔干团结理论及整合思想的应有之义, 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期盼实现的“个体与社会、国家与世界和谐共存”理想的当代表达。面向未来的道德教育, 也必须重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公共伦理和人与自身的类伦理, 开展道德教育”^[9]^(p46), 培养人的“类伦理自觉”, 促进人的类本性的发展和完善。或许只有依赖这种超越狭隘、超越单一个体、立足人类伦理、强化伦理连接的复合型伦理筹划, 才能距离我们实现“社会团结”的目标更近一步, 从而确保社会伦理秩序的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 [1][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3.
- [2][法]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3][法] 埃米尔·涂尔干. 自杀论[M]. 冯韵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4][法]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5][法] 爱弥尔·涂尔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

渠东, 付德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渠敬东. 涂尔干的遗产: 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J]. 社会学研究, 1999(01):31-51.
- [7] 李建华. 伦理连接: “大断裂”时代的伦理学主题[J]. 浙江社会科学, 2019(07):100-106+158.
- [8] 戴兆国, 韩旭.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资源与时代意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1(04):55-60+186.
- [9] 冯建军, 刘霞. 走向类存在: 面对人类发展困境的道德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 43(10):41-4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思政专项“基于数字技术的高校思政课效能提升研究”(23JDSZK179)的阶段性和成果。